

建安文学全书


徐幹集校注

夏传才 / 主编 林家骊 / 校注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建安文学全书

 徐幹集校注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幹集校注/林家骊校注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3. 6

(建安文学全书/夏传才主编)

ISBN 978-7-5545-0239-6

I. ①徐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徐幹(170~218)-文集 IV. ①I213.41

北京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6810 号



徐幹集校注

作者 林家骊

责任编辑 郝建国 高树海 姬璐璐

封面设计 牛亚勋

责任印制 张涛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, 050061)

印制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 6.875

字数 166 千字

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5-0239-6

定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《建安文学全书》总序

夏传才

—

东汉末年，社会动乱。宫廷内以阴谋弑篡争夺皇位，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以血腥屠戮夺权，政治黑暗腐败。大地主豪强势力膨胀，土地兼并剧烈，田租达到实际收成大半，大旱、大疫、雹、蝗等自然灾害连年发生，受灾地区广阔。史载京畿七郡和冀州（今河北中南部、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）大饥荒，发生人食人的惨剧。北方匈奴、鲜卑、乌桓、羌、胡等少数民族侵略内地，南方蛮夷等族暴动。为发兵内外征讨，统治集团一再增加赋税徭役，激起各地民变。

光和六年（183年）又大旱。巨鹿（今河北平乡西南）张角创太平道，以实现天下太平为号召，发展到数十万人，遍布幽、冀、青、徐、兖、豫、扬、荆诸州，中平元年（184年）在各地同时起义。起义军头裹黄巾，史称黄巾军，攻陷州郡，声势浩大，天下响应，其中仅青州黄巾即发展到百万之众。黄巾军的主要成员是饥民，大多带着老小乃至耕牛转战。所以这场战争的农民起义性质十分明显。原先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地主阶级不同集团，暂时联合起来，在各地镇压农民起义军。经过几年血战，农民军被镇压了，而在战争中也形成遍布

全国各地的大小军事集团，拥有在各地的绝对统治权，皇室丧失了所有的实际权力，名存实亡，被立为皇帝的九岁的献帝刘协，只是傀儡，在军阀大混战中被西北军阀董卓劫持而去。在这些军事集团中，曹操集团采取了比较高明的政策和策略，在战争中，迅速发展成实力比较强大的集团之一。他的集团由三个部分组成：一是以曹氏子侄为骨干的嫡系部队，二是收编青州军三十万人选拔精锐的“青州兵”，三是地方豪强武装力量归附，迅速建立了兖州根据地。他实行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，蓄军资，霸王之业可成”的基本策略，于196年派兵迎回献帝奉为天子，建都许昌，改元建安。从建安元年（196年）至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，史称建安时期（献帝在建安前还曾有初平四年、兴平二年两个年号，时间都短，史学家一并归属东汉末期）。在这个时期中，曹操掌握中央政权，荡平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，恢复经济，发展生产，实现社会安定，封为魏王，立都邺城（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村一带），与东吴孙权集团、西蜀刘备集团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。曹操曾多次出师讨吴伐蜀，志在统一天下，未曾达到目的，于建安二十五年病故于洛阳。同年，曹丕袭魏王，继而称帝建立大魏皇朝。这就是建安时代，一个战争动乱的时代，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、由大乱趋向治平的时代，一个英雄和才智之士辈出的时代。这个时代的文学在历史上称为建安文学，也即东汉末期三十年的文学。

二

建安文学是这个大时代的真实记录和艺术反映。

面对国家分裂动乱，目睹生民苦难，有志之士或从军、或从政、或从文，纷纷投入这个时代火热的斗争。他们共同的理

想是争取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和平，重建国家，改造社会，使人民安居乐业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，他们要建立的国家，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，最高的理想也只能是比较关怀民生、比较注重司法正义的开明的封建国家。如曹操所实行的抑制土地兼并，打击豪强势力，减免税赋，推行垦荒，后来严明军纪，节俭国用，以及不拘一格使用人才，恢复文化教育等等，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，保障社会安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；其中所表现的人文精神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。描述统一与分裂、战争与和平的斗争，绘出生民凋敝，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（曹操《蒿里行》）的画图，表现出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（曹操《步出夏门行》）、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（曹植《白马篇》）等等为国事献身的豪情壮志，是建安作家创作共同的主题。其中的许多名篇，千古传诵。当时的作家和作品很多，呈现“彬彬之盛”的局面。社会发生重大变革，西汉以来独尊儒学的影响衰落，作家思想从儒学束缚中得到解放，也写作抒写个性的作品，如友谊、爱情、个人的抱负、追求的渴望和功业未成的苦闷，乃至脱离现实困境求仙访道的幻想，他们有感而发，言个人之志，抒个人之情，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说，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作家“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”。他们自觉地不迷恋显赫的社会地位，创作有益于治国而得到“不朽”的名声。鲁迅称建安文学是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。

建安文学直接继承《诗经》和汉乐府歌诗的优良传统。梁代钟嵘曾评论建安作家的作品分别源自《国风》和《雅》。他们最优秀的创作继承了《诗经》的风雅比兴传统并

加以发展，创造出一种被名为“建安风骨”（或名为“汉魏风骨”）的突出的艺术风格。所谓“风”，取自《国风》的风化、风教，即真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风气，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高尚的精神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解释它是志气的表现，感化的力量，意气骏爽，情志明朗，简言之，是由作者思想情感和气质性格所形成的一种高尚健康的思想情操，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感动人的力量。所谓“骨”（或称骨力），即精当运用文辞，锤炼文字达到精确难以更易，凝练有力的语言形式。刘勰多次把风骨二字并提，又概括为“风清骨峻”四字，即充实、清新、思想健康、高尚的内容与刚健凝练有力的语言形式的统一。建安文学的“建安风骨”是《诗经》“风雅比兴”传统创造性的发展，它们共同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。建安作家的诗赋，以反映现实、批判现实的精神，或以对太平时代的憧憬，寄托戡平战乱、重建开明盛世的理想和抱负，也坦露胸臆，或比兴寄托，抒写在这个大时代中个人的性情，作品大都深沉真挚，生动感人。在艺术形式上，多是合乐的诗歌，各体并陈。曹操、王粲的五言诗表现为汉以来五言诗体在艺术上臻于纯熟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是后世七言诗的滥觞，他的《典论·论文》是中国较早的文学批评专著。曹植的辞赋则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建安文学以其多方面的卓越成就，被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
建安文学的成就不仅表现于诗赋创作，也表现于散文作品，而且就作品数量来说，散文作品更多。建安时代有大量的各类散文，不乏优秀之作，在中国散文史上有开创性的建树。我们这里讨论的建安文学，其“文学”一词，与现代文艺学中“文学”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。现代的文学一词包括的是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剧本创作、抒情和记叙散文等，不包括应用文；而从文体学来看，先秦到两汉，文学与学术没有分家，诗

赋与奏议书铭等文体都统称文学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把建安时代的文体，分为四科八类：尚雅：奏（奏章）、议（议摺），尚理：书（信札）、论（评论），尚实：铭（碑文、铭文）、诔（祭文）；尚丽：诗、赋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区分的文体更多。在建安文学中铭、诔、诗、赋四体是韵文，更多的是奏、议、书、论各体，凡无韵的，都统称散文。这类文章，真实而且直接地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军事、政治斗争及其战略、策略和具体政策，包括那些行政工作中的表、令等，都有其历史文献价值。这些散文并非全无艺术性，有的文章如曹操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，七子中陈琳阮瑀等的章表，曹氏兄弟的书信等等，其中的佳作，语言凝练，善用修辞，声调铿锵，感情充沛，叙事形象，抒情委婉。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，一直包括这些文体在内。

鲁迅称赞曹操是“改造文章的祖师”，他的文章主要是令、书、章、表，一反刻板的套式和行文的拘谨，直抒所见所想，大胆直率不受拘束，大气磅礴，又用语简约，挥洒自如，表现出清峻、通脱的风格。曹氏兄弟的章、表和书信，也清新流畅，如曹丕的两篇《与吴质书》写得凄婉哀痛，抒情浓郁；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，写得慷慨悲壮，充溢着抑郁不平之气。七子中王粲文学成就最高，长于诗赋，其书、论体散文也清峻通脱。他们的一部分散文都是抒情散文的名篇。曹丕曾对七子散文一一作出评论，总的评价是：“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遣，于辞无所假，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”（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）孔融的文章恃才负气，敢怒敢骂，以气盛见长；盛孝章、祢衡的文章器量雅伟，词情恳切，慷慨有英伟豪杰之气。陈琳以书檄名世，铺陈夸饰，以富丽见长。阮瑀也擅长书檄文表，在马上为曹操草拟致孙权书，书成而曹操不能改一字。徐幹文章辞义典雅，曹丕评论其《中论》“成一家之

言”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评论其文“公幹笺记，丽而规益”（《书记》）。七子各有所长。

对于建安作家群，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说：“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爱诗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辞赋；陈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笔琳琅。并体貌英逸，故俊才云蒸。”钟嵘《诗品》也说：“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笃好斯文，平原兄弟蔚为文栋，刘桢、王粲为其羽党，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，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。”这两段文字说明了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及其活动的盛况。曹操作为一位政治领袖，“外定武功，内兴文学”，他重视延揽人才，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政治军事人才，其次就是文学之士。他和他的儿子凭借政治上的领袖地位，广泛地收揽文士，使文学人才大量集中，形成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，曾达百人之众。三曹的倡导以及他们富有创造性的作品，自然地成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。

“七子”之名，源出自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，对这七人一一提名并作出评论。其实，曹丕所提名的这七子，文学成就不一，有的人成就并不太大，建安作家中有的人的成就在实际上超过他们。因为当年曹丕未提名，被后人忽略，作品更多散佚，渐渐少为人知。例如仲长统（180～220），其散文创作活动多在建安时代，现仅存诗二首、文一篇及代表作《昌言》，计十余万字，对东汉末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，对统治者的荒淫误国作了有力的抨击。现代评论家称其文“笔下点点滴滴都是血泪，字字句句都是控诉”（《中国古代文学通论·汉代散文概述》）。经孔融称赞的“情词恳切，慷慨有英伟豪杰之气”的祢衡，现仅存文五篇。女诗人蔡琰建安初被乱兵所掳，后流落匈奴，建安八年（203年）由曹操以金璧赎回，另嫁后又遭变故，身世凄惨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作品一

卷，现仅存《悲愤诗》两篇、残句一句及尚未肯定是否其作的长诗《胡笳十八拍》。繁钦、吴质、应璩、邯郸淳、左延年、刘劭、荀悦等皆一时之俊，现存作品有多有少，现从各种文献统辑出三曹七子以外建安文学的作者三十一人，他们的作品亟须汇总整理，避免年代更久而湮没。

建安作家们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，一部分作家与曹氏父子政治集团并无依附关系。以七子为例，曹丕将孔融列为七子之首，而孔融（153～208）并不属于曹操集团，而是站在曹操的反对派（拥汉派）的一面，结果在建安八年被曹操杀掉，并诛其妻孥。他死在曹操攻占邺城之前，所以他不属于“邺下文人集团”。祢衡（173～198）也是反曹的，戏曲《击鼓骂曹》演唱的就是他的故事，结果被曹操“借刀杀人”，借另一军阀的手杀掉。七子中的陈琳（？～217）初服务于曹操的劲敌袁绍，曾写《为袁绍檄豫州》颂扬袁绍功德，历数曹操恶行，写得声情并茂，后降附曹操负责起草军国书檄，他写的《檄吴将校部曲》，以同样笔法，铺陈夸饰，盛赞曹操，可作依附文人的典型。他与七子中的王粲、刘楨、应玚、徐幹，先后皆死于随军南征途中。这些事实让我们看到：当时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“士”，是依附于一定阶级的某一政治集团的，他们为某一政治集团服务，赖以生存并谋求功禄，他们具有依附性，不可能有独立性。曹操是位英雄，他一生戎马，舍生忘死地长期投入激烈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，在战争中亲冒矢石，勤俭治事，完成了大半个中国的统一与和平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在社会发展上有其贡献，在文学史上也有他创造性的重要影响；但我们也不能为他唱赞歌，在他战争生涯的前期曾经杀戮屠城，后来为收揽人心才严明军纪，但将领们执行并不严格；为蓄积军资推行屯垦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生产，但从收成中征收百分之六十的实物，并严格剥夺耕种者的

自由，实质上是实行人身完全依附的农奴制。他重视延揽人才，但人才必须为己所用，否则便无情地杀掉。在曹操晚年，丕、植二子结党争位，很有才华的文学之士杨修依附于曹植，为避免曹氏集团内部矛盾激化，善于深谋远虑的曹操，在逝世前百日，借口泄漏军机将杨修杀掉。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，在具有政治家素质的同时，曹操也具有机诈、疑忌、残忍的一面。这是封建时代政治家共同的品质吧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政治家，又何尝不曾如此！

三

这套丛书是 2007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。

建安文学与河北有比较密切的关系。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一带是建安文学后期活动中心，建安文学作家生长和活动在这里，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也写作在这里，写出了河北大地的山水、风土和人情。

曹操于建安九年（204 年）至建安十年（205 年），进攻邺城，转战邯郸、中山、河间、南皮诸地，后平定冀州全境，建大本营于邺城；后晋爵魏公、魏王，立邺城为都。直至建安二十五年（220 年）曹丕称帝，建都洛阳，邺城为魏都达十五年左右。当时献帝所在的许昌，名义上是“国都”，但曹操领丞相，在邺城办公，许昌的朝廷是个空壳，献帝是个丝毫不起作用的傀儡，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在邺城。当时的军国书表由这里发出，四方的章表也送到这里来，邺城是政治文化中心，也是文学活动的中心。曹丕建都洛阳以后，邺城仍定为东都。在魏晋南北朝时代，邺城先后为魏、后赵、北魏、前燕、东魏、北齐共六代之国都。

曹操靠战争胜利起家。他部队中的劲旅是从收编的三十万“青州黄巾军”中选拔的精锐，其中很多燕赵健儿。向曹操归

附的地方豪强武装，基本上也来自黄河以北各郡，曹军平定和统一北方，从西征并州，到东征乌桓，主战场也在河北境内。曹操创作的歌诗名篇，都写在邺城时期。如《苦寒行》是建安十一年（206年）曹操自邺城北上攻克壶关（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），描写太行山道行军的艰险，绘出从邺城向西北山行的军旅图。《步出夏门行》五首，写于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，曹操北征盘踞东北的乌桓奴隶主集团，通过冀南、冀中，经无终（今天津蓟县），出卢龙塞（今河北迁西北喜峰口附近）直捣柳城（今辽宁朝阳）。凯旋回师途中，在今河北昌黎的碣石，写下千古绝唱《观沧海》；《冬七月》和《土不同》写河朔的隆冬景色及邺城归途中所见河北大地隆冬的风土人情；《龟虽寿》的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更写出步入老年的曹操在胜利后的雄心壮志；《短歌行》是他平定北方以后，与部属在铜雀台上饮宴时的歌唱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……”他慨叹人生短促，天下尚未完全平定，希望像周公一样收罗人才，天下归心，一统天下，实现太平。《气出唱》以下几首歌诗是六十岁以后所作，晚年他苦闷于暮年来临，而统一天下的抱负未能实现，写出幻想长生的游仙诗。现存的他的各体散文，除前几篇，大部分写在建安年代，其中百分之八十写在邺城时期。他在邺城开辟西园，修建铜雀、金虎、冰井三台，与其子和群臣登台而赋。在他倡导下，鼓励了他部属的能文之士，结成文学团体开展文学活动。

曹军攻占邺城时，曹丕十七岁、曹植十二岁，他们都在邺城长大，除了父亲出征时随军经受锻炼，大部时间生活在邺城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他们也爱好文学，学习创作，现存《曹丕集》、《曹植集》保存有他们早期的作品，还有他们在贵公子时期与文友们结社唱和的记录。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描写西园、铜雀台以及当地的自然景色，也反映他们在这里的友谊和

生活。由于他俩的特殊身份，依附于曹氏集团的邺下文士自然以他们为文坛领袖，由他们安排酒宴定期集会，邺下文人集团曾达到百人之众的“彬彬之盛”。这个集团的骨干，主要是孔融之外的六子，在邺下的文学活动中各有创作上的建树。可惜，建安十七年（212年）阮瑀早逝，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曹军南征，王粲、陈琳、刘桢、应玚皆随军，死于大瘟疫，次年徐幹亦死于疫病。七子凋零尽，建安二十三年（218年）繁钦亦卒，邺下文学活动趋向衰落。

建安文学后期以邺城为中心，这个文学集团的大部分作家，工作生活在现在的河北，也有许多作品写在河北，而且写河北，所以应该是今日河北历史上的一个文学集团活动。那些写河北风土人情、自然风光的名篇佳作，可以作为河北历史上乡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唐杜牧绝句《赤壁》曰：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曹操当年建三台，铜雀台是其歌舞会宴之处，金虎台是其处理军国政务之处，今金虎台仍在，铜雀台被漳河水冲蚀得只剩一角台基。当年曹操登台歌诗，曾命丕、植会群臣登台为赋，其赋犹存，读那些诗赋，当年繁盛可见。丕、植、六子皆有游西园诗，如：“朝游高台观，夕宴华池阴。大酋奉甘醪，狩人献嘉禽。齐倡发东舞，秦筝奏西音。有客从南来，为我弹清琴。”（曹丕《善哉行》其二）“览宫宇之显丽，实大人之攸居。建三台于前处，飘飞陛以凌虚。连云阁以远径，营观榭于城隅。亢高轩以迴眺，缘云霓而结疏。仰西岳之崧岑，临漳滏之清渠。”（曹植《节游赋》）“清夜游西园，飞盖相追随。明月澄清景，列宿正参差。秋兰被长坂，朱华昌绿池。潜鱼跃清波，好鸟鸣高枝。”（曹植《公宴》）再现了台、园的美景与繁华。西望巍峨太行，南临漳水清波，三台殿宇腾空，西园碧波红莲，鱼翔池底，鸟鸣绿枝，各方音乐齐奏，四方外宾来

朝，在这美丽的画图中又再现了当时北方各民族的融合。现邺城三台遗址经邯郸市临漳县规划已开始修建，工程有初步成绩。开发地方文化资源，是很有意义的工作，既是实际的热爱乡土的爱国主义教育，又可以发展旅游产业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。对地方政府开发邺都文化资源的工作，我们给予支持，所以省委把编纂《建安文学丛书》列为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。

四

编辑三曹、七子及其他建安作家的全集，采取丛书的形式出版，有益于研究中国文学黄金时代这一段文学的全景，当然也有益于河北文化史研究和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。我们仍然需要按照建安时代“文学”一词的含义，編集所能收集到的章、表、书、论、铭、诔、诗、赋各体文章，不局限于现代文艺学所界定的文学作品。这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，并使之具有历史学、政治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多方面价值。

建安以后又是天下动乱时代，建安文章诗赋散佚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曹丕有集二十三卷、《典论》五卷和《别异传》三卷，到宋代，据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所称：“今诸家诗文散见于《文选》及诸类书，其以《集》传者，仲宣（王粲）、子建（曹植）、孔璋（陈琳）三人而已。”曹操、曹丕连个文集都未传下来，遑论他人？明张溥编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才为各人辑集，收录既不全，而且自《文选》、类书等抄录，未经校勘，又多文字讹误。清代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近人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下大力气分别搜辑，其中建安文章诗赋部分，是当前保存建安诗文较多的两部总集，限于时代条件，搜辑和校勘难臻至善，亦无注释，一般读者难读。1950年以后规划整理古籍，建安文学以三曹为重点，七子次之，七子外未入规划。在半个

世纪中，出版的别集有曹操三本、曹丕一本、曹植二本，七子有王粲一本、合集一本，七子外无人搜辑，在各类文学选本中偶有单篇诗文选入。现在编的这套丛书共九册，计《曹操集校注》、《曹丕集校注》、《曹植集校注》、《孔融陈琳集校注》、《王粲集校注》、《徐幹集校注》、《阮瑀应玠刘桢集校注》、《三曹七子外作家诗文合集校注（上、下）》。

建安时代距今一千八百年，社会有很大发展，对他们的评议有较大变化。现有传本，或系白文，或注释简深，而文中有关人物、事件，必须作出注释，以助阅读理解，而得传承。几本别集，前人作过校勘标点，成绩很好，我们在文字上再作一次校勘，仍有所得；篇目顺序按时代先后作了适当的调整；在内容上也据所见有所增添，如《曹操集》，我们增加了曹操为《孙子兵法》所作的注，因为这些注文是曹操所体会的重点，有的类似笔记，表现了他个人关于战略战术的一些见解。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，我们希望每个集子的内容做得更完备一些。至于七子中有的作家从无专集，尤其是七子外的作家诗文，是我们第一次汇总为集，计作者三十一人，其中间有伪托之作，学术界尚未决断，亦一并收录，以备研究。我们的设想如上，由于主编人才识所限，各书校注者水平不齐，阙误之处，尚祈方家不吝指正。

河北省委、省政府和河北师范大学对本丛书给予积极支持，河北教育出版社给予热情协助，谨致诚挚的谢意。

2008年6月于思无邪斋

前 言

徐幹，字伟长，北海（郡治今山东潍坊西南）人。与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同列为“建安七子”。

关于徐幹的身世生平，无名氏在《中论序》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：

一、身世生平

其（徐幹）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，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德，至君之身十世矣。君含元休清明之气，持造化英哲之性。放口而言，则乐颂九德之文；通耳而识，则教不再告。未志乎学，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。年十四始读五经，发愤忘食，下帷专思，以夜继日。父恐其得疾，常禁止之。故能未至弱冠，学五经悉载于口，博览传记，言则成章，操翰成文矣。此时灵帝之末年也，国典隳废，冠族子弟结党权门，交援求名，竞相尚爵号。君病俗迷昏，遂闭户自守，不与之群，以六籍娱心而已。

……

君避地海表，自归旧都，州郡牧守礼命，踧踖连武欲致之。君以为纵横之世，乃先圣之所厄困也，岂况吾徒哉！有讥孟轲不度其量，拟圣行道，传食诸侯，深美颜渊、荀卿之行。故绝迹山谷，幽居研几，用思深妙，以发疾疢，潜伏延年。会上公拨乱，王路始辟，遂力疾应命，从戎征

行。历载五六，疾稍沉笃，不堪王事，潜身穷巷。颺志保真，淡泊无为，惟存正道。

……

年四十八，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，遭厉疾，大命殒颓，岂不痛哉！

从这篇序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徐幹是以一个守道儒者的身份立身行事的。他熟识经典，恪守先道，淡泊名利，潜心治学。在三国那个战乱频仍、民风凋敝的年代，众人皆以汲汲于功名为务，如徐幹之立身行事者实属罕见。

《先贤行状》中也有关于徐幹的记载：“幹清玄体道，六行修备，聪识洽闻，操翰成章，轻官忽禄，不耽世荣。建安中，太祖特加旌命，以疾休息，后除上艾长，又以疾不行。”此处所谓“清玄体道，六行修备”、“轻官忽禄，不耽世荣”与前《序》中所论不差。

徐幹曾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，随曹操西征马超，南下赤壁。两次随征可在其《西征赋》、《序征赋》中略见端倪。《魏志·王粲传》载：“（幹）为五官将文学。”知徐幹曾为曹丕文属。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称赞徐幹说：“伟长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者矣。”《晋书·郑袤传》又载：“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，精选宾友，袤与徐幹俱为临淄侯文学。”知徐幹也做过曹植的文属。曹植有《赠徐幹诗》：“顾念蓬室士，贫贱诚足怜。薇藿弗充虚，皮褐犹不全。慷慨有悲心，兴文自成篇。”我们从曹植的诗中也可以看出徐幹的清贫乐道与笃好文章。此外，刘桢有《赠徐幹诗》、《又赠徐幹诗》两首，表达了两人之间的诚挚友谊。《赠徐幹诗》曰：“谁谓相去远，隔此西掖垣。拘限清切禁，中情无由宣。思子沉心曲，长叹不能言。起坐失次第，一日三四迁。步出北